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

宋俊华 © 主编

晚清民国时期 广州粤剧城市化研究

黄 纯 ©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

宋俊华 ◎ 主编

晚清民国时期 广州粤剧城市化研究

黄 纯 ◎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城市化研究/黄纯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6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6 - 05935 - 2

I. ①晚… II. ①黄… III. ①粤剧—戏剧史—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粤剧—戏剧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J82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1142 号

Wanqing Minguo Shiqi Guangzhou Yueju Chengshihua Yanjiu

出 版 人: 王天琪

责任编辑: 王延红 陈俊婵

封面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刘丹萍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7.5 印张 5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学科独立（代序）

21 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面开展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生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国家的、族群的、地区的、社区的传统文化正在以新的符号形态被人们所认知、重塑，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技能、经验、知识、习俗和仪式等正在被一种新的概念符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统称，与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启动的物质遗产保护相呼应，“文化遗产”正成为新世纪的一个主流词语，“遗产时代”已经正式开启。另一方面，与传统文化一样，学术生态也在经历一个重塑的过程，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开展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正在兴起，关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技能、经验、知识、习俗和仪式的某一侧面、某一领域特殊性的传统研究和传统学科，正在以一种新的面貌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认识论来看，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要经历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不断循环递进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 21 世纪的兴起，正是人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从关注“特殊性”部分到关注“普遍性”整体转变的一个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对象如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曲艺、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传统医药、民俗等，曾经被作为文学、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工艺学、曲艺学、体育学、医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特殊对象，也是这些学科之所以独立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提出，正在改变这些传统学科的现有格局，推动人们关注这些学科对象背后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即这些学科对象所指的传统是如何被当下特定国家、族群、地区、社区、群体乃至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如何传承和传播的，以及如何保护和发展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一个短期的社会运动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才能实现。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之所以兴起、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界

定为“采取各种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保护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可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所在，所有保护措施都要围绕这个核心来实施。在过去十多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性措施，如确认、研究、宣传、弘扬等，主要以评审、公布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代表，如“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等。另一类是行动性措施，如立档、保存、传承、振兴等，主要以开展普查，建立档案馆、数据库、传习所，开展传承教育、生产实践等为代表；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实践探索。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理解，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性措施、行动性措施的执行，都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传统学科如文学、戏剧学、音乐学等主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是什么、有什么发展规律等问题，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是什么、如何保护等问题却关注较少。后两个问题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宣传性措施向行动性措施转换的重要基础。一言概之，传统学科重在“解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试图“保护世界”。

无论是解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构成的“世界”，还是要保护它，我们都要面对许多新的问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求的统一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客观存在的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具体的社区、群体和个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社区、群体和个体及其生产、生活实践的差异性，自然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要承认每种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合法性，并为其多样性存在提供保护。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和规则，要求在多样性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建立一种统一性或普遍性，而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存在造成新的干预和规范。这类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本体性问题，也是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才能直接面对的问题。又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问题，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断被凸显出来的问题。外来访问者往往比本地所有者更加关心这个问题。对外来访问者而言，认识、研究和保护一个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离开“本真性”标准，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固执地认为这个“本真性”标准是绝对的、静止的，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上，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对其日常生产、生活中从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往往是以能否满足其即

时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为衡量准则的，所以，在他们眼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若能够满足他们即时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就有本真性，否则，就没有本真性，绝对的、静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是不存在的。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协调外来访问者与本地所有者关于“本真性”认识的不同，建立一个涵盖外来访问者与本地所有者共同认可的“本真性”，也是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才能真正回答的问题。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实践探索，要真正转变为一种普遍性的范式和理论，也只有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才能实现。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国家和地区来说，往往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等相联系，这方面的深入和系统研究，也有赖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发展。

正是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与问题的科学认识，基于对传统学科转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独立的准确判断，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近十五年来，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学科理论建设工作。我们除了每年编撰出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蓝皮书）外，还陆续编撰出版了“岭南濒危剧种研究丛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等，这次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是上述丛书的延续。我们将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案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交流等专题进行编撰出版，在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同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宋俊华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2018年2月10日

序 言

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与城市密切相关。城市化是传统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本质上来说，传统戏剧城市化进程就是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嵌入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市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过程。

晚清民国时期，以开埠为先导的广州城市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开启了新的城市化进程。这一时期，刚刚从乡土文化中成型的粤剧迫不及待地赶上了这场变化，两者之间的耦合必然对粤剧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特征产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戏班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直接生动地反映了粤剧的城市化进程。晚清民国时期，粤剧人寿年班经历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剧目编演、班业运营、班社组织和身份认同上做出了很大的调整和努力。但是，城市特殊的生存环境以及戏班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得人寿年班的进城之路显得更加曲折和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粤剧人寿年班一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着艰难反复的逡巡与抉择。城乡并存、城乡联合不仅仅是人寿年班独有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身处广州城市的大多数粤剧戏班共同经历和普遍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

第二，晚清民国时期，广州演剧场所经历了由临时搭棚向新式剧场过渡的关键转轨期。广州剧场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西风东渐”的影响，对西方剧场在器物层面上的学习和借鉴，使得广州城市戏院的观演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在剧场的精神内核方面，新式剧场却与中国传统观剧理念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战乱年代人们社会行为的失范，大大消解了新式剧场的仪式感，使得广州城市戏院徒有其表，而缺乏内在仪式性精神。这正是盛极一时的现代戏院迅速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也为后来粤剧在城市的发展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第三，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粤剧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粤剧传统审判风格也在悄然发生转变。粤剧的审美趋向不再延续农村演剧时期那种从传统宗教伦理纲常的角



度,甚至从教化的角度加以观赏的审美定式,而是深受城市各方面因素影响,从创作、演出、改革、宣传、评论等方面完成了一套观演机制的创建和一套观剧话语的规范,从而建构了一种以观众为中心的审美框架。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粤剧审美风格的城市化转型,也推动了受众群体审美趋向的城市化进程。

第四,清末以前,粤剧以落乡演出为主,戏班与邀演方之间长期处于一种流动性的市场关系状态。吉庆公所虽为买卖戏中介机构,但在市场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城市市场经济的萌发促使粤剧原有市场体系的瓦解,逐渐形成了由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和市场中介三者组成的较为完整的市场机构体系,推动粤剧行业从传统市场形态向近代市场形态转变,使得粤剧行业的整个运作机制嵌入新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当中。近代市场机制的引入,引起了粤剧业态一系列特征的变化,使得粤剧艺术实现了从乡土文化样式向都市大众消费文化样式的转型。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粤剧行业的纠纷案件层出不穷,多元参与的纠纷调解格局,真实地勾勒出粤剧行业发展的某些质变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粤剧行业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法制建设的不健全。

第五,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粤剧的传播以人际传播为主,依靠乡土社会中各类民俗活动而存在,同时借助其他民间艺术形式强化了自身的民俗特质,形成了一个与乡土社会相契合的传播体系。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新的传播手段的产生和传播技术的更新,报刊、广播电台和电影等大众媒介不断涌现,原本寄身于民俗活动传播于村落空间的粤剧艺术,受传媒时代文化逻辑力量的召唤,衍生出新的多样化的传播方式。置身于新的文化语境中,借助报刊、广播电台和电影等各种现代传媒,粤剧对自身的传播方式做出了调适,以去生活、去语境的方式进行符号拼贴、重装和改造,从而裂变为一种诉诸符号消费需求的媒介景观样式或消费意象,成为一种具有典型后现代文化特质的传媒消费文本,并为处于近现代转型的广州城市增添了一种大众审美文本。

第六,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乡土社会,借助“神灵”的名义,通过神功戏的演出,粤剧发挥了娱神、娱人和交际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在这个过程中,粤剧演出建构了以祭祀功能为主,其他功能为辅的功能格局。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广州近代城市化的开启,粤剧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逐渐发生变化,而粤剧的功能及其主次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改变。娱神功能的削弱、娱乐功能的强化、交际功能的延伸以及政治功能的凸显,演变出了粤剧的多种演出形态,使得粤剧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复杂而多元的角色和身份。在传统的商演之外,粤剧寄身于各种新的社会活动中,成为其融入社会、融入近代广州城市的重要途径。同时,在不同的展演空间,粤剧向着更适合该场域的文化和身份表达方

式发展,最终实现了从祖先崇拜、祭奠祈福、人神同悦、族群认同的传统功能格局,向具备文化展演、族群认同、礼仪社交、社会团结、庆典娱乐、情感宣泄等社会功能并存的新格局的转变。

第七,作为粤剧的行会组织,八和会馆自成立之日起就与粤剧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晚清民国时期,粤剧进驻广州城市,八和会馆无论在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业界地位等各方面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和挑战。为此,八和会馆开始了自身的调整 and 改革之路:改革领导体制;被迫调整行规,适应市场需求;作为粤剧行业的自救组织,为粤剧发展出谋划策,保障会员生活;调整自身定位,协助政府管理粤剧等。这一时期的八和会馆俨然成为政府职能和市场运行机制之间的有效补充,起到了中介协调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八和会馆重新树立起其在业界和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了由传统行会组织向具有近代性意义的同业公会的转化。

第八,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兴起,作为城市娱乐文化之一的戏剧也被纳入市政管理的范畴。这一时期,广州市政府的戏剧管理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由浅入深,由探索、试验到逐步定型的过程,其管理进程深受市政管理理念及社会改革浪潮的影响,对近代广州城市戏剧管理及戏剧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在文化管理体制的探索和试验过程中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理念,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借鉴意义。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广州市政建设对戏剧活动的管理始终笼罩在政治服务的气氛中,使得戏剧的发展潜藏着内在的危机。军人滋扰戏院这一初看细微的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不仅屡禁不止,反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府管理理念的落后和实际效能的缺失。到了后期,时局动荡,政府对戏剧的管理开始出现职能错位、管理职责不清的现象,既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又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使城市戏剧偏离了自身发展轨道而走向衰落。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粤剧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粤剧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经历了一个反反复复的发展过程。但是,从总体倾向来看,仍然表现出了从与乡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乡土文化向适应城市民众生活方式的城市文化样式发展转变的过程。随着近代广州城市化的发展和演变,粤剧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以市民性为核心,以商业化和现代化为结构底蕴,以市场交换为生存法则,并形成一套与之相应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模式的城市文化样式。

传统戏剧在城市中的日趋衰落,一直是戏剧学界挥之不去的难题。本书以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力图拓展戏剧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为传统戏剧在当代城市的传承发展提供借鉴的蓝本,同时也加深对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文化的研究。

目 录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选题 / 1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4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11
- 第四节 研究目标 / 12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12
- 第六节 研究综述 / 13

第一章 粤剧城市化历史概况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戏剧的城市化进程 / 23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的城市化进程 / 25
- 第三节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博弈
——粤剧城市化的艰难历程 / 32
- 小结 / 38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班社的城市化进程

- 第一节 从“红船班”到“省港班与落乡班”的分野 / 40
- 第二节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
——粤剧人寿年班进城始末考述 / 47
- 第三节 逡巡与抉择
——粤剧人寿年班在城乡之间的生存策略探析 / 63
- 小结 / 72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演出场所的城市化进程

- 第一节 “前戏院”时代广州的观剧环境及其嬗变 / 75
- 第二节 清末广州第一家戏园考 / 81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四大戏院的兴起 / 91

第四节 中西融合下的都市狂欢

——百货公司天台游乐场的演剧活动探析 / 107

第五节 器物与精神的错位

——对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民众观剧行为的反思 / 122

小结 / 129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审美风格的城市化演变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化对粤剧剧本生产机制的形塑 / 131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粤剧剧目的城市化表征 / 142

第三节 移植、利用和包装

——粤剧例戏在城乡演出的对比研究 / 151

第四节 从神仙道化到机关布景

——晚清民国时期粤剧神仙剧的传承及嬗变 / 162

第五节 民俗艺术的城市新装

——晚清民国时期粤剧服饰的革新 / 166

第六节 “薛马争雄”与近代粤剧改革之路 / 184

第七节 大众传媒下粤剧审美共同体的营构 / 196

小结 / 210

第五章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市场机制的建立及运行

第一节 清末以前粤剧业的市场交易模式 / 213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市场机制的建立 / 216

第三节 市场机制下粤剧业态的变迁 / 230

第四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演剧纠纷案件的产生及其背后原因的阐释 / 234

小结 / 244

第六章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传播机制的嬗变

第一节 粤剧传统的传播机制 / 246

第二节 报纸：粤剧与现代大众传媒的首度联姻 / 250

第三节 民国时期广播电台与粤剧粤曲的发展

——以广州市播音台为例 / 260

第四节 民国时期粤剧与电影的结盟 / 271

小结 / 277

第七章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功能的延伸与转化

第一节 粤剧神功戏的功能剖析 / 280

第二节 城市化进程中广州粤剧娱神功能的削弱 / 287

第三节 城市化进程中广州粤剧娱乐功能的强化 / 294

第四节 城市化进程中广州粤剧交际功能的延伸 / 303

第五节 城市化进程中广州粤剧政治功能的凸显 / 313

小结 / 318

第八章 晚清民国时期粤剧行会组织城市化变迁考察

第一节 八和会馆的成立及基本职能 / 320

第二节 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运作 / 329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八和会馆管理职能的转变 / 337

第四节 八和会馆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 344

小结 / 349

第九章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影响

第一节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戏剧管理进程探析 / 351

第二节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管理对城市演剧的影响 / 362

第三节 民国时期广州市政府戏剧管理的经验与教训 / 375

第四节 失范与控制

——民国时期广州戏院中的军人之患 / 383

小结 / 391

结 论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的城市化进程 / 394

第二节 对当代传统戏剧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 397

参考文献 / 400

后 记 / 420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选题

城市在中国传统戏剧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元之际，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勾栏瓦肆的兴盛，带动了南戏和杂剧的繁荣，北京和杭州就是当时戏剧活动的重要城市；明清时期，传奇戏的发展和繁荣，就与南京、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晚清以来，京剧、粤剧的兴盛则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可见，在传统戏剧发展历程中，每一个戏剧发展的繁荣时期都和当时城市的发展有关，每一种戏剧形态的成熟和最终完成也都是依托在当时最繁华的商业都会或中心城市。传统戏剧的每一次革新提升，城市化都是不可绕过的重要一环。显然，研究传统戏剧城市化过程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但是以往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代表性论著有李真瑜《北京戏剧文化史》和《城市文化与戏剧》，范丽敏《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田根胜《近代戏剧的传承与开拓》，张炼红《“海派京剧”与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建构》，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1867—1949）》等。

乡村演剧研究的方兴未艾，让我们反观到城市演剧研究的匮乏和价值。近年来，乡村演剧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和探讨。陈守仁教授、容世诚教授以及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对乡村演剧活动的研究，让中国戏剧史的书写有了新的方向和视角。然而，当戏剧史的研究推动到这一地步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乡村演剧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来说，都无法与已有的城市演剧研究成功地嫁接起来。乡村演剧研究更多地从人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考察，而以往的城市演剧研究则更多的是从商业性、艺术性及审美性的角



度加以展开,更多地关注其文学、艺术、美学和历史的研究。所以,当我们看到“巫风雉影”时很难联想到“梅兰芳”“昆剧昆曲”等唯美的艺术展现。这样的断裂和错位似乎造就了中国戏剧研究中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从而在表面上导致了“乡村—城市”“祭祀—观赏”等一系列对立概念的产生。关于前者能否向后者转化以及如何向后者转化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书试图从城市化的视角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定的关联性及对话嫁接的可能性。

传统戏剧在城市中的日趋衰落,一直是戏剧学界的难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传统戏剧在现代社会的命运问题就一直是戏剧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原因的探讨,宋俊华教授在《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一文中总结了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传统戏剧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体制僵化、剧目陈旧、形式老化、节奏太慢,跟不上时代发展节奏;二是认为观众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戏剧普及教育缺乏,观众对传统戏剧了解甚少;三是认为演出生态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现代艺术门类多,电影、电视、网络等分流了观众。”^①文章又指出,“针对上述三点,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无论是改革戏剧院团体制、积极编创新剧目、创新表现形式,还是加大传统戏剧教育和宣传,却仍然无法改变传统戏剧在城市中不断衰落的现实。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还另有原因”^②。那么,原因何在?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弄清楚传统戏剧是如何在城市中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这就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传统戏剧的城市化进程。

此外,有一个现象同样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当前传统戏剧在农村与城市的生存境况大不相同。以粤剧为例,易红霞在其博士论文《戏班与剧团——一个城市国营粤剧团的身份困惑》中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粤剧)剧团在城市的演出,常常是演一场赔一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粤剧在乡村演出的红火和在海外演出的热闹。每年春节和中秋重阳节前后,粤剧的春班和秋班演出特别红火,不仅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深圳等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戏金年年上扬,每逢过年过节,锣鼓喧天;粤西的吴川、电白、茂名一带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是‘乡场渔港无不披红挂绿迎戏班,村村寨寨犹见结彩张灯演大戏’,春秋班演出十分旺台,多年不衰。”^③由此,便引出了一些颇有意思的话题:难道传统戏剧在农村就没有在城市中所遇到的问题吗?如果也有,那么戏剧在农村仍然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城市与农

① 宋俊华:《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载《戏剧艺术》2013年第6期。

② 宋俊华:《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载《戏剧艺术》2013年第6期。

③ 易红霞:《戏班与剧团——一个城市国营粤剧团的身份困惑》,中山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村对传统戏剧的发展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提供了不同的演出环境吗？这无疑为我们研究传统戏剧在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启发，仅仅就农村谈农村、就城市谈城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尝试将城乡演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农村与城市的关联中，从城市化过程中认识这种现象，揭示其形成的原因，为城市戏剧的发展指明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与城市密切相关。城市化是中国传统戏剧发展中颇具特色的重要环节，也是传统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势。对这一进程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利于揭示祭祀性戏剧与观赏性戏剧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有利于回答和解决传统戏剧在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和困惑，这正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和事实依据。

本书以粤剧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粤剧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在演出形态、传播途径、演出功能以及戏剧管理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晚清民国时期粤剧城市化进行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考察，挖掘城市演剧的内在生成机制和发展演变规律，拓展戏剧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为传统戏剧在当代城市的传承发展提供借鉴的蓝本，同时也加深对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文化的研究。

选取晚清民国时期广州粤剧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粤剧与中国大多数地方剧种一样，根源于乡土社会的祭祀戏剧或仪式戏剧，随后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是乡土文化进入城市并被城市化的代表，是研究文化城市化的典型案例。自诞生之日起，粤剧就与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文化的艺术投射和重要象征。目前，粤剧研究尚未系统展开，更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粤剧史和粤剧演出形态的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梁沛锦《粤剧研究通论》，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赖伯疆《广东戏曲简史》，陈守仁《仪式、信仰、演剧：神功粤剧在香港》，余勇《明清时期粤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李计筹《粤剧与广府民俗》和黄伟《广府戏班史》等，从城市化角度研究粤剧的成果尚不多见。

第二，晚清民国时期，是粤剧实现城市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粤剧一方面延续着之前传统乡土社会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又由于城市的质变而逐步走上了近代城市化的新道路。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是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等话语并存，并且相互碰撞、交融和异变的关键时期。粤剧的现代审美风貌和艺术品格也在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晚清民国时期粤剧的发展演变是近代以来传统戏剧城市化的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个案。

第三,广州作为中国城市化“先行一步”的城市,具有十分突出的“标本”意义。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经历了由传统省城向近代城市的转变,致使进入广州城市的粤剧面临与以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带来了近代粤剧城市化新变。在封建帝制时代,广州城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属物,城市的基本职能是作为官员办公的场所,因此,清末以前的广州未曾有独立意义上的地方经济和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方市政建设。而清末以后,随着市政建设的逐步展开,广州才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向近代城市转变。在如此疾风骤雨般的城市化变革中,广州在城市建设、市政管理、地方经济发展和近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完成了生发和完善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粤剧有了进驻广州城市的契机和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迸发出强大的能量,活跃和带动了整个广州城市的文化娱乐业的发展,成为广州城市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总之,在城市化的动力推进和历史文化传统的阻力妨碍的博弈关系中,晚清民国时期粤剧城市化进程及道路的探索,代表了近代城市转型过程中大多数进城的地方曲艺所面临的发展境遇和转型特点,是中国传统戏剧城市化基本风貌的折射和缩影,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作为近代通商口岸及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城市,广州粤剧的城市化又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价值内涵和文化意义,值得我们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晚清民国时期(1840年6月—1949年9月)

晚清民国时期的时限范围是从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始至1949年9月中华民国终结止,共11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由传统城市走向近代城市的重要时期,也是传统戏剧开始走向城市,摆脱农耕社会文化空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的关键时期。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在城市上演,传统戏剧在城乡发展的速度比发生变化,这是重新探讨和研究城市戏剧兴起的绝佳境域。

二 城市与城市化

在古代,“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古代的“城”基本都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而建立的,城的周围由城墙或护城河围起,形成对于政治集团相

对安全的封闭空间，城里也会有服务于人们生活和消费的各类部门，但多依附于官僚和地主，缺乏致力于交换的独立生产性产业。“市”，在古文中是动词，义为买，后来专指进行买卖贸易的地方，历史文献中经常有“设立互市”的记载。

城市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恰如斯宾格勒所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①从城市的起源看，人类历史上的城市是伴随着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的扩大，剩余产品与交换的出现以及人类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而出现的。城市从远古的要塞、交易点发展成今天的近代城市、大都市、巨型城市乃至全球城市，是很多世纪城市化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结果。

与城市一词的概念性，即与农村相对的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空间的抽象概况相比，城市化是一个描述性的词，侧重表现城市的动态发展变化。最早提出城市化概念的是西班牙工程师A. 塞尔达（A. Serda），他在1867年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从词源上来说，城市（urban）一词在英语中早就存在，而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则是以城市为词根派生出来的。如果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进程从城市诞生的源头起就已经开始，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指的是工业革命以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即“社会经济形态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是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过程”^②。

城市化不仅仅意味着人们被吸引到一个叫作“城市”的地方，而且还应该包括人们被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之中的过程。“城市化也指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不断增强的过程。最后，它指人们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而在他们中间出现的显著变化。”^③城市化，实质上意味着人们的居住形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迁，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凸显城市特质的过程。

三 广州城市

广州，是一个外延不断扩大的概念，初为州名，继为府名，最后成为市名。本书主要采取城市范围和城市生活特征两个方面相结合的方式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广州城市进行界定。

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在20世纪以前，广州没有正式的市政机构。清朝地方行政管理实行城乡合治，城市虽然是各级官衙的所在地，但是没有管理城市自身事

①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6页。

② 陈甬军等：《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9页。

③ [美] 路易斯·沃斯著，赵宝海、魏霞译：《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载《都市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